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SHING FUND PROJECT

中国文字发展史

中国文字发展史

中国文字发展史

中国文字发展史

中国文字发展史

中国文字发展史

中国文字发展史

中国文字发展史

中国文字发展史

中国文字发展史

中国文字发展史

中国文字发展史

中国文字发展史

中国文字发展史

中国文字发展史

王元鹿
朱建军
邓章应 主编

民族文字卷

丛书主编

臧克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中国文字发展史

中国文字发展史

中国文字发展史

中国文字发展史

中国文字发展史

中国文字发展史

中国文字发展史

中国文字发展史

中国文字发展史

中国文字发展史

中国文字发展史

中国文字发展史

中国文字发展史

中国文字发展史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上海高校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出版工程

丛书主编
臧克和

中国文字发展史

民族文字卷

王元鹿
朱建军
邓章应 主编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文字发展史. 民族文字卷 / 王元鹿, 朱建军, 邓章应
主编.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3. 5
(中国文字发展史/臧克和主编)
ISBN 978-7-5675-0737-1

I. ①中… II. ①王…②朱…③邓… III. ①文字—
历史—研究—中国②少数民族—文字—历史—研究—中国
IV. ①H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112942 号

中国文字发展史·民族文字卷

丛书主编 臧克和
本卷主编 王元鹿 朱建军 邓章应
策划编辑 王 焰
项目编辑 张继红
审读编辑 王 海
责任校对 林文君
装帧设计 高 山

出版发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社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 邮编 200062
网 址 www.ecnupress.com.cn
电 话 021-60821666 行政传真 021-62572105
客服电话 021-62865537 门市(邮购)电话 021-62869887
地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华东师范大学校内先锋路口
网 店 <http://hdsdcbs.tmall.com>

印 刷 者 上海中华商务联合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 16 开
印 张 26.5
字 数 410 千字
版 次 2015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7 月第 1 次
书 号 ISBN 978-7-5675-0737-1/H·632
定 价 99.00 元

出 版 人 王 焰

(如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订质量问题, 请寄回本社客服中心调换或电话 021-62865537 联系)

71-03010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古汉字与其他民族古文字同义比较研究”(项目编号:02JAZJD740015)最终成果

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重大课题“中国文字数字化工程——中文信息化补缺建设”阶段性成果

撰稿人(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元鹿 邓章应 冉启坤 朱建军
刘悦 李杉 李明 李静
李子涵 邱子雁 高慧宜 唐均
黄思贤

总序

断代·系统·量化

汉字经历了漫长的演变历程而没有中断使用，以形表意属性具有连续性，在周边民族地区和国家间存在着广泛的传播影响，这在世界各种文字体系中是独一无二的。一般说来，与具体实现剥离，有助于逻辑抽象；而汉字形体结构，直接参与区别语义，则天然地具有易与事物建立同构关联的属性。汉字的发展，形成了种种错综复杂的关系，以至于汉语学者工作者在记录语言的符号系统的各种文本关系里面摸索，就要穷气尽力，基本无暇进入科学的语言文字系统建设。长期以来，汉字发展史研究的现状，停留在一般文献学水平，整体落后于语言学研究，也落后于其他人文基础学科。相对于高校中已开设数十年的“文学发展史”（包括各体文学发展史）、“批评发展史”、“逻辑发展史”、“哲学发展史”、“思想发展史”、“艺术发展史”等基础课程，“汉字发展史”则基本阙如。这种局面，对于文字发展的认知、文字使用的需要、文字标准的制定，甚至汉字学科体系的教材建设，都形成了显而易见的制约。

从上个世纪到现在，随着考古材料的大量公布，特别是各类文字资源库的建设，断代的文字调研逐渐成为可能。文字发展断代描写，主要涉及文字的数量消长——不同时代社会用字所增加、所消亡的情况；文字的体制变迁——不同时期书体类型及形体变化情况；文字的使用生态——不同时期社会使用及制约影响文字使用变化的媒体介质传播技术等因素。比如说，对于大量文字形体，整理者甚至还无法准确回答它们的出现年代以及使用环境，客观上只能说断代的文字调研平台尚不具备。文字发展到今天，其调研平台不够完善，数据分析不能穷尽，文字发展断代描述基本上不能置一词，一定要硬着头皮去作笼统描述，实际上也是徒劳无补的。

各个时期断代的汉字发展调查，至少要回答：汉字体制基本属性，由基本属性所规定的特定研究对象研究范围即学科基础在哪里；某个时段里社会上使用了多少字以及哪些字形，这些字在体制上体现了哪些历史特点；还要进一步回答一个时期使用增加了多少字、哪些字形，这些此消彼长背后的时代性因素（包括技术、媒介、文化、体制等）是什么。呈现这些消长变化，还得进行跨时段的对比统计分析。否则，所谓发展就无从谈起。因此，断代的文字使用调查，其实是件困难的事情。基于相对穷尽性量化数据分析，进行断代调查和描写；依据文字使用事实，探究文字发展理论；真实呈现各个重要时间段落文字特点和一般发展规律，关注发展的系统性，以及影响发展的因素和环境：形成《中国文字发展史》断代各卷的描写特色。依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重点基地“汉字断代调查与汉字发展史（13JJD770031）”规划，基于各类文字数据库，在字形结构、使用频率、构件成分等相对穷尽统计基础上，在先秦（包括商代、西周春秋、战国）、秦汉（包括秦国、秦代、两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等文字发展阶段（唐宋之际及唐宋以降的印刷文字、汉字规范及汉字处理，宜单独分卷描述），计划分期分批完成断代汉字发展史描写若干卷，包括受到汉字发展影响的少数民族文字卷。根据系列重大课题及文字数据库加工的实际，第一期首批完成先秦、隋唐五代及少数民族部分，其余将发展为第二批。就是说，基于漫长的汉字发展使用历史，《中国文字发展史》调查与描写，呈现为开放性体系，相对充分成熟部分，将陆续发展。《民族文字》比较卷、《先秦文字》发展卷、《秦汉文字》转型卷、《魏晋南北朝文字》过渡卷、《隋唐五代文字》定型卷等，仅从选题来看，就不难发现，虽说是断代层次的描写，但也是相对而言的。每个断代专题，其实跨越了历史时段，都会涉及单位书体发展历程考察。

文字发生问题，实质是属于所谓“跨学科”问题。单纯依赖文字学领域，总显得力不从心。一向因材料不充分、相关科际学术资源整合的困难，汉字发生研究成为文字学领域被长期搁置的课题。但是，搁置实属无可奈何。这个问题不能深入讨论，甚至连文字性质等问题的深入认识也不能不受影响。

在有关论场合，我们曾提出分层次讨论的观点。就是关于汉字的发生问题，

有必要考虑符合认知规律的文字类型学划分。在汉字发生阶段，符合实际的分类，成为基本前提；不同类型，发生时间自然会存在出入。汉字发生研究建立在某种类型学基础上，即不同结构类型汉字的发生是有阶段性的。因此，笼统的汉字发生研究难以深入。即使最具图画意味的汉字，其抽象程度也大大高于图像。表意结构，既然是历史积累的结果，同样存在一个时代性问题：如果较早早期发生的表意字形，与语段文字、图画文字有关的话，跟后来派生的会意之类表意结构属于什么关系？结构源于某种仪式，使用于特定场合，也是早期汉字发生现象之一。在汉字认知领域，汉字作为视知觉对象，进行习得观察，其关键环节，往往也就是进行符合视知觉规律的分类。^①

关于汉字的发生，文字学界以往比较审慎的评估，基本上都是以现存殷墟甲骨文字为基础的。这批以龟甲和兽骨为载体的古文，则是已成熟的文字，属于距今 3000 多年前的商代晚期的成体系文字。正如有的研究者所指出：“一些学者坚持两个标准，一个是字形本体的标准：与商代的象形文字如甲骨文、金文等形体相似者，就认为是文字，否则就不是；一个是功能标准：如果这些已知的史前图形、符号具有记录语言的功能，就是文字，否则就不是。”“但这两个标准都值得商榷。第一，字形标准不够全面，因为人们无法证明商代文字的字形就是最早的汉字的唯一形式。第二，根据现有的资料，无从直接证明史前图符是否具有记录语言的功能。”^②

何靖《中国文字起源研究》，专题讨论中国文字发生及其机制问题。作者认为，在世界范围内，从旧石器时代晚期开始就陆续出现了图画和符号，但这些并不是都能发展为文字体系。而所谓文字体系，是有不同层次的，有关研究者把文字体系划分为巫师文字和通行文字。巫师文字主要是在巫术中用于人神交流，其本质是巫术精致化的表现；而通行文字则是运用于人际交流的书面符号系统，可以应用于社会各个方面。巫师文字和通行文字是两个不同层次的文字体系，后者是在前者的基础上发展而成的。

《中国文字起源研究》，特别着力于文字生成机制，强调大规模贸易活动

① 臧克和著：《汉字取象论》，第一编“汉字取象之诞生”，圣环图书公司（台北），1995年；臧克和：《结构的整体性——汉字与视知觉》，《语言文字应用》，2006年第3期。

② 连登岗编著：《基础汉字学教程》，第一章“汉字的产生与发展”之二：“汉字的产生与形成”，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33页。

是文字发展为通行文字的必要条件。有关考古学研究表明,文字的生产大致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图画和符号的出现;第二阶段,巫师文字形成;第三阶段,通行文字的形成。由图画和符号发展为巫师文字,需要有一定程度发展的农业经济基础,由巫师文字发展为通行文字,则需要具备开展较大规模贸易的条件,包括相当发展程度的农业、畜牧业和手工业,需要有优越的地理条件,需要能利用畜力和使用车辆之类的运载工具,需要在同一时期多个文明的并起,而由此开展的较大规模贸易,则是通行文字形成的原动力。

基于上述,何靖根据文字生成机制的三阶段理论,对中国新石器时代的文字符号的性质作出判断:中国新石器时代的文字符号都已经是文字,但都属于巫师文字,而尚未成为通行文字。因为这些文字符号都是在农业经济的基础上产生的,都毫无例外地还不具备较大规模的贸易条件:在同一时期多个较高级度的文明还没有出现,还未能利用畜力和使用车辆之类的运载工具,成规模的畜牧业、手工业还未出现,等等。准此,研究者认为,夏代不可能形成通行文字,夏代的文字符号,仍然处于巫师文字阶段。商代已经形成了一个社会通行的文字体系,这早已得到学术界的公认。但学者大都认为在商代文字之前还有更早的文字。通过前面的讨论,关于商代文字之前是否有更早的文字,可以明确地回答说,商代之前是有文字的,但基本上处于巫师文字阶段,这些巫师文字都没有发展为通行文字。^①

① 何靖著:《中国文字起源研究·引论》,巴蜀书社,2011年,第1—66页。考古发掘以及人类学等材料的陆续发现,也越来越超乎以往人们的想象。例如,不久前有考古发现所谓“4500年前的甲骨文字”:在山东昌乐出土的100多块兽甲骨上,刻有600多个符号,结构和布局上有一定规律可循,应该为4500年前的早期文字。有考古学者专题从事所谓“骨刻文”的调查研究。新华社报道了在翁牛特旗高日苏大黑山发现绘有原始文字符号的岩画。报道称这是百余座山中发现的40处数千幅岩画的其中之一,这些岩画距今已有5500年至4200年的历史。发现者因此认为,它的出现证明了中华古文字应该有5000多年的历史。2005年《宁夏日报》则有报道称“大麦地岩画文字比甲骨文还古老,大麦地岩画中的发现有可能改写中国的文字史”。新华社报道称,内蒙赤峰市翁牛特旗人文历史研究员吴甲才向与会者展示的岩画,在2平方米的岩面上有各类文字符号30个,是由17个基本符号元素组成的,按照文字符号的形态、排列位置及其所示方向,可能是一幅祈福图。此图与在大黑山半山腰发现的一幅人面鱼纹像和两幅小河沿文化时期的巫字岩图有着内在的联系,都与史前的巫术活动有关。这些岩画其中12幅附有上下连贯的初始文字符号,373幅附有独立体初始文字符号,这些文字符号年代之久远、数量之多在全国少见,经过考据属于红山文化晚期至小河沿文化时期。

经西北第二民族学院岩画专家普查和研究,中卫北山大麦地有3172组约8400多个岩画个体图形,内容包括日月星辰、天地神灵、狩猎放牧和舞蹈、祭祀等。岩 (转下页)

所谓“巫师文字”，如何纳入文字发生系统考察，自然存在若干有待研究的课题。但是，如果从原始文字功能考虑，如不能适当顾及文字结构与巫术仪式之间的宛密关联，对于若干古文字形的理解，看似“坐实”，其实大类南辕北辙，有望形附会的危险。跨学科研究课题，需要不断积累。随着地下考古资料的陆续发掘，关于该领域的调查研究，也将不断深入。^①

二

迄今为止，商代文字依然是现存最早的成体系的文字。调查商代文字材料，有甲骨文（或称契文）、金文、陶文等。其中尤以甲骨文数量为最多，因此，文字学界将甲骨文作为商代文字的代表，一般将甲骨文分为下列五个发展分期：一期：盘庚、小辛、小乙、武丁时期；二期：祖庚、祖甲时期；三期：廩辛、康丁时期；四期：武乙、文丁时期；五期：帝乙、帝辛时期。

由于书写载体和写刻工具的缘故，龟甲兽骨上面的文字似乎不如铭铸在青铜器和陶器上面的字形更加接近书写用笔原貌。甲骨文是契刻文字，往往书写之后再施以契刻。甲骨上也有用毛笔留下的朱墨痕迹，但数量很少。甲骨文属于宫廷档案公文，基本用于占卜祭祀，构成当时文字传播使用的主要范围。

两周时期是历史上汉民族在民族融合、政治体制、商贸经济、文化艺术诸方面第一个大繁荣时期，该时期文字使用功能扩大，文字系统获得长足发展，达到古文字阶段的最高水平。两周时期主要文字载体发生了很大转变，现存主

（接上页）画专家采用丽石黄衣测年方法测得早期岩画距今 18000 年到 10000 年。对上述岩画个体图形进行研究表明，大麦地岩画区内图画符号是我国原始文字，1500 多个象形符号具有中国原始文字的基本象形形态，在大致同时期的陶文符号和后来的甲骨文中可以找到相近的形象。由两个以上的象形符号组成的复合体，已基本具备象形字、会意字、指事字等文字的要素。更为重要的是，这种象形符号在大麦地岩画中绝非偶然和孤立，而是排列有序。岩画专家最终得出结论，大麦地岩画，有许多象形与抽象符号已具备古老文字的要素（引自 <http://www.sina.com.cn> 2005 年 09 月 16 日 09:32 《宁夏日报》）。出版界的专家乐观估计，大麦地岩画中的发现有可能改写中国的文字史（《人民日报》2005 年 8 月 18 日海外版第 2 版）。

① 臧克和著：《古汉字结构取象类型原始移情考略》，《学术研究》，1999 年第 5 期；《一类古汉字发生与仪式》，《袖珍汉学》，2005 年第 2 期。

近年来出土良渚文化类型，亦有人称为前甲骨文文字，且较甲骨文字早了上千年云云。

要式样是铸刻在青铜器上的铭文，这些铸刻在青铜器上的铭文，其书写程序是先刻写于范坯，再经烧铸而成。由于范坯质地柔软属性，便于书写、修饰加工，书写者更加得心应手。因此，金文线条的艺术表现力要比甲骨文空间丰富些。

春秋战国时期文字使用范围日趋广泛，文字形态、书写材料丰富多样。其中，金文资料仍然占有相当比重。此外，简牍、丝帛、玺印、泉布、玉器、石刻、陶器等材质，也都是当时实用文字载体。特别是春秋晚期的侯马盟书、战国时期的楚帛书、战国中晚期的楚简，保存了大量用软笔书写的文字。

通常将先秦文字分为殷商、西周春秋和战国三个时段。所谓古文字发展史，主要也就是这几个时段。最近几年，大批战国楚系文字的简牍材料陆续整理公布，吸引了众多古文献古文字学者。商周文字到战国简牍字符，无论从文字功能的使用范围，还是从文字本体的调查统计来看，都获得了空前发展。但是，真正对该时段文字发展状况进行较为彻底梳理和描述，有待于先秦古文字资源库建设。殷商西周春秋战国文字发展，就是以基于数字化的定量方式，从字集、字频、异体、构件、结构、体态等角度来描述先秦出土文字的发展演变状况，将首次完成先秦汉字发展史的断代研究。

商周各个时段各类材料到底有多少字？殷商基本字集——甲骨文字集，得到的甲骨文字形数为 6227 个；殷商金文字集，得到殷商金文字形总量 1507 个。西周春秋基本字集——西周金文的字集，统计出《金文编》收录西周金文 2302 个，统计出西周金文的字形数量为 2870；春秋金文的字集，从 25083 字量的春秋金文用字中统计出单字 1458 个。战国字集——统计出战国金文的字形数量为 1774 字，楚简文字类型多：以《楚文字编》原收录材料为依据，补遗文字 175 个，以上博简材料为依据，补遗文字 843 个，以新蔡简材料为依据，补遗文字 298 个。上述数据的给出，整个先秦文字资源总盘子也就有所把握了。

各类异体数量与比例：1. 甲骨文异体字，通过对《总表》的勘误和增补，重新考察了甲骨文中的异体字，得到了甲骨文异体字的基本数据：异体字为 1031 组，其字形总数 3081 个，因而在 6227 个甲骨文字形中，字头数实际为 4065 个。甲骨文异体字形总数占甲骨文单字字形总数的 51.89%。这个比重大大超过后世文字系统，表现了字形系统内在规范性较差的早期文字特性。2. 西周金文异体字，整理统计表明：西周金文中 572 个字头下存有异体，异体字涉及字形总数 2134 个。异体字涉及字头在总字头数的比重由 26.92% 下降为

19.93%，异体字涉及字形在总字头形数中的比重由 52.01% 下降为 48.15%——西周金文异体字在文字总量中相对甲骨文的比重下降，总体上无疑表明了这样一个事实：从殷商发展到西周，汉字构形的差异化程度降低，规范化程度提升。

3. 战国异体字，除了时代的差异，还要相应考虑分域等因素。战国文字整体和分域的异体字数量比较调查。调查数据首先表明：相对西周金文，整体战国文字异体字数量比重有较大幅度的降低：前者的异体字涉及字头占总字头数的比重为 19.93%；后者的同口径数据则只有 7.39%；前者的异体字涉及字形占总字形数的比重为 48.15%，后者的同口径数据则只有 20.26%。显然，这种数据的变化，反映了汉字系统随着时代的推移内在的构形规范程度有了很大的提高，即使遭遇了地域分歧加大的因素，这种趋向依然是非常明晰的。其次，相对整体战国文字异体字的上述两个比重，楚、秦、晋、齐、燕五系文字的同口径数据均有大幅度降低（楚为 4.19% 和 3.52%，秦为 0.85% 和 1.10%，晋为 4.90% 和 4.91%，齐为 1.58% 和 1.96%，燕为 0.74% 和 0.77%），这就表明，战国文字的构形差异，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各地域系别文字之间的构形差异所造成的，因此，目前的战国文字地域分系至少是有一定客观依据的。

关于殷商到两周“四书”结构发展，断代系统描写专题同样给出了可资对比的量化数据。通过分别以不重复字形和卜辞用字总量为统计基础，研究者得出这两个不同的层面的甲骨文“四书”结构在有效字形总量中的数量比重。以字形数为统计基础的量化结果：甲骨文的统计结果全面补正了既有研究的相关数据，其结果为，象形字占总字形量的 40.16%，指事字占 5.06%，会意字占 40.89%，形声字占 13.89%。殷商金文的同口径统计结果印证支持了甲骨文的统计数据的真实性。这个结果相对于小篆，表现了甲骨文在结构层面上原始程度。以文献用字总量为统计基础的量化研究：这个角度的统计，开拓了一种全新的关乎结构的量化研究路径，统计结果相对以不重复字形为基数的统计，数据发生如下变化：象形和指事的比重有所上升：象形从 40.16% 上升到 76.97%，指事从 5.06% 上升到 7.67%；而会意和形声则有较大幅度的下降：会意从 40.89% 下降到 12.67%，形声从 13.89% 下降到 2.5%。殷商金文的同口径统计结果同样印证支持了甲骨文的统计数据的真实性。该角度统计数据的这种变化，意味着独体字在甲骨文的常用字集中比合体字占据更高的比重，是对许慎“先有文后有字”之说所作的一个很好注脚。同时，对于汉字发生史意义上

的汉字性质认知，也提供了参考数据。

西周文字“四书”类型的量化研究，以不重复字形数为基数的西周金文“四书”类型调查统计表明，从殷商甲骨文到西周金文，字形系统中四书的比重发生了如下的变化：象形从 40.37% 下降到 11.57%，指事从 5.59% 下降到 0.48%，会意从 40.86% 下降到 32.97%，形声从 13.75% 上升到 54.98%。也就是说，单纯表意的三书均有不同程度的比重下降，而只有形声有了大幅度的比重上升。以字形在文献中的总用量为基数的西周金文“四书”调查统计表明，首先，从甲骨文到西周金文，象形比重从 76.97% 下降到 53.28%，指事比重从 7.665% 下降到 2.25%，会意比重从 12.67% 上升到 21.05%，形声比重从 2.5% 上升到 23.43%。毫无疑问，这些数据变化，清晰地体现了汉字在结构层面的发展趋向：“文”的被使用概率的下降和“字”的被使用概率的上升都呈现了较大的变化幅度。其次，从文献实际用字的角度来看，汉字结构发展的速度，要大大低于不重复字形层面呈现的幅度，而这与甲骨文的同口径统计数据相比较，也呈现了高度的一致性，这足以揭示汉字结构发展的一种规律。

殷商西周春秋战国文字发展，还可以从字集、异体、字频、构件、结构、体态等部分，来描述殷商、西周春秋和战国三个时段出土文字系统的联系和发展状况。

字集。旨在回答文字系统究竟包含了哪些文字单位这个最基本问题。殷商时段：首先以《新编甲骨文字形总表》为起点，进行甲骨文字形数的全面清理。经逐个查核原拓，全面吸取相关考释研究成果，增补《花东》等新材料，完成了《新编甲骨文字形总表》补正暨甲骨文字形数量的清理，并确定其在 GBK、CJK 扩展字集中的传承状况。其次，通过对《金文编》收殷商金文补正，确定了殷商金文字形总量，及其对甲骨文字形的补遗。西周春秋时段：通过一手材料整理来增补《金文编》收字，依据相关考释研究改释《金文编》定字，完成了该时段金文字形数量的清理，并确定其在 GBK、CJK 扩展字集中的传承。战国时段：以《战国文字编》、《金文编》及其校补系列、《楚文字编》所形成的互补字汇集作为研究起点，通过全面整理一手材料和相关考释研究成果，完成了对这几个文字编的补遗和改释，进而对该时段字形数量作了初步确认，并作了该时段新见字以及字符集种类的归类。

异体。旨在清理各时段异体字数量状况以描述各时段文字的规范程度。殷

商时段：重新确认了甲骨文中的异体字数量，并基于这个数量论证了如下发现：甲骨文具具有内在规范性较差的早期文字特性；单字所含异体数与含异体单字数呈反比例增长趋向；多异体的字在字用上具有高频、多义、表达文献热点语言单位等特点。西周春秋阶段：通过异体字数量状况的确定，论证了两个发现：从殷商到西周，汉字构形的差异化程度降低，规范化程度提升；该时段多异体字头所含的异体字数大大超过甲骨文，根源于更大的地域分布所导致国族差异。战国时段：首先进行了战国文字整体和分域文字的异体字数量调查，数据证明整体战国文字异体字比重较前代有大幅度的降低，而各地域系别文字异体字比重又低于整体战国文字，从而揭示了整体战国文字构形差异的造成有各地域系别文字之间的构形差异的成因。其次进行地域系别文字的内部差异研究。以异体字数量最多的楚文字作为材料对象，调查其内部是否存在构形差异的下位子系统，调查数据给出了基本否定的回答。

字频。旨在弄清文字系统中各文字单位在实际文献中的被使用次数，并以此检测特定时段文字系统成熟程度。殷商时段：通过甲骨文字频调查统计得到如下发现：甲骨文字频具有高度的两端集中状况（即少数高频字占总字量的高比重和总字量中极低比重的低频字占单字总数的极高比重）；这种体现文字系统的不成熟性的两端集中状况与甲骨文的程式、内容特点有一定关联；甲骨文的高端集中的字频现象本质上反映的是殷商汉字表达语义以简驭繁的一种断代特点；甲骨文字频的低端集中与殷商文字记录语言内容的专用化程度相联系。西周春秋时段：调查统计表明，1. 该时段字频状况较之殷商时段的主要差异表现为：最高频端的集中度有所下降；最低频端的集中度基本保持殷商时段的水平；中间频次字在数量上全面上升。2. 高端集中与铭文程式、骈辞、字用特点三种因素相关；3. 文字用法的数量总体上是与字频数成正比，高频字倾向于与普通词汇，特别是基本词汇对应。低端集中首先与专名类用法字相联系。战国时段：以《郭店楚简》为古书类文献代表，《睡虎地秦简》为文书类文献代表，战国金文为铭刻类文献代表，在全面完成了它们的字频调查统计的基础上，完成不同类型文献的字频比较研究、战国出土文献字频状况的断代特点、国别地域差异与字频状况关系的研究三个专题研究。

构件。旨在通过文字构形底层要素的深入调查去揭示文字构形系统的本质特征。殷商时段：在完成了各类甲骨文及殷商金文构件的数量调查，修订了相关既

有研究的结论的基础上，揭示了甲骨文构件具有高频者少、低频者多这种与图画遗存相联系的特征；辨析了一批具有罕见性、暂见性、图画性及后世变异特征的特殊构件；基于构件的统计研究，提出了完善现行甲骨文部首系统的方案。西周春秋时段：以金文为对象的构件数量调查表明，相对殷商时段，构件参与不同字形构字的平均几率提升，一级构件比重大幅度下跌；由于平均不同构件的构字数量的趋向，导致了中间频次段构件数量增加最多。论析了本时段新见的特殊后世变异构件。战国时段，根据构件的系统定量研究对材料的系统性及丰富程度的要求，选定秦简和楚简帛文字分别作为西土和东土文字的代表，在完成其构件数量调查及其断代意义评估的基础上，通过两者特异构件的比较来量化其地域差异。

结构。旨在通过文字各种结构的分布及消长调查来描述各时段文字的发展状况。殷商时段：首先，分别以不重复字形数和字形在文献中的总用量为基数，得出这两个不同的层面的甲骨文“四书”结构在有效字形总量中的比重；其次，完成各种结构功能所含构件数量及各构件所具有的结构功能数的调查统计。以此为依据论证了殷商文字中结构层面的多种特征。西周春秋时段：以不重复字形数为基数的调查统计表明，从殷商甲骨文到西周金文，单纯表意的三书均有不同程度的比重下降，而只有形声有了大幅度的比重上升；以字形在文献中的总用量为基数的统计表明，从文献实际用字的角度来看，汉字结构发展的速度，要大大低于不重复字形层面呈现的幅度；构件的结构功能数量的调查首先揭示了表声构件的数量已上升到各功能类型构件之首，表声构件大大高于表义构件的增长，表明了形声字发展中对形符具有更严苛的选择性，这种选择应当是与该时段形声字发展以标类为主要途径相联系的。其次，象形、指事构件与会意、表义、表声构件的两者结构比重相对殷商文字的明显的变化，表明了本时段文字结构的更高的发展程度。战国时段：以字集的完整性和语境的清晰度相对符合材料要求的秦简和楚简帛文字为对象，进行了本时段结构类型分布的断代及地域特点调查；选择上博简、侯马盟书、战国货币文字三种典型材料，完成了战国文字结构的“无理化”演变的量化调查。

体态。旨在通过自然结构和层次结构这两种直接诉诸视觉的文字构形成分调查来揭示文字系统的发展变化。殷商时段：从独体字与合体字比重、合体字平面组合类型数量分布、层次结构的数量状况三个层次完成了对甲骨文构形的数量调查，并以小篆、现代汉字的相关指标为参照，揭示了其中凸现的断代文

字特征。西周春秋时段：完成了对应于殷商时段的调查口径的各层次调查，数据表明在独体字与合体字比重、层次结构的两个层面本时段文字呈现了更高的发展程度，而在合体字平面组合类型数量分布的层面，本时段金文呈现了更低的发展程度。论证了合体字平面结构上的“倒退”现象与严苛的甲骨契刻书写环境的反常作用力相联系。战国时段：继续对应前时段的三个研究层次完成调查统计，在证明本时段文字体态发展程度总体高于既往的基础上，揭示了不同地域文字的发展不平衡状况及其促发因由。

先秦汉字发展演变的探索，是一个不乏既有研究成果的研究方向，而以严格定量论证的方式去做这种研究，此前却是乏人问津的。上述六个指标，不但把总体目标定位在这种前沿上，而且在各个具体问题的研究上，均努力将既有前沿研究成果为起点来展开进一步的研究，故在“先秦文字发展”这个题目下，实现了较为全面的创新研究。

三

古文字到近今文字的发展转型，在汉字发展史上影响到体制层面的重要过程，主要就是隶变楷化。隶变楷化，存在一定重合。关于隶变本质，就文字体制而言，就是将古文字阶段的线条为书写结构单位，解散转化为今文字的以笔画为书写结构单位。笔画的数学几何属性为线段，跟线条是相对的。经过隶变之后的汉字，笔画就构成有效区别单位。关于隶变发生过程，文字学者已将目光投到战国简牍材料。其中秦简材料体系上属于秦系文字，时间上则由战国延续至秦代，隶变发生不会晚于战国。现存云梦睡虎地秦简文字，整体上已处于篆隶之间，一定程度上保留着篆书的意味，被称为“古隶”。

国家统一，秦王朝实行书同文政策。国家政府在文字改革、规范方面进行的工作，力度之大，在历史上空前绝后。学者们认为：“秦国统一以后的官方用字是小篆；小篆虽然同秦王朝一样，存在的时间并不长，但它却代表了古文字阶段汉字书法艺术的最高成就；从文字的结构来说，小篆结体严谨、规范、匀称、平正，线条的力度均匀，行笔流畅自然，字体固定，异体字减少；从其来源上看，小篆源于秦国统一以前所使用的大篆，而大篆直接源于西周文字。从统一之前的秦国社会生活实际用字来看，比如前述云梦睡虎地秦简，所用文

字是软笔即毛笔墨书的秦隶，其中像甲乙两种《日书》，集中反映秦朝当时社会民俗用字状况。对照起来，大体可以推测当时的小篆书体主要限于宫廷场合、某些特定仪式等。^①

汉代经济文化，繁荣昌盛。两汉前后历时达四百二十余年，隶书和草书是该时期的重要书体类型。隶书由秦隶过渡到汉隶，逐渐走向成熟，达到艺术上的高峰。同篆书一样，隶书影响深远。只要查询有关实物用字语料库，就显而易见，即使到了隋唐，像墓志碑刻一类仪式化程度高的场合，还经常见到使用复古性隶书，庄重典雅。“草书”作为书体类型专称，有其特定的含义，则是汉代才出现的。东汉许慎《说文解字·叙》所谓“汉兴有草书”，即特指一种书体而言。文字学者书法家认为：隶书与草书本是同源，它们都是汉字的草写，但后来却朝着两个不同的方向发展演化着——隶书逐渐变得笔画分明，书写规范；而草书却朝着线条缠连、草率流畅的方向演化。

秦汉文字演变调查资源丰富，除了上述云梦睡虎地秦简之外，其他简牍类举其大者就有马王堆帛书、银雀山汉简、居延汉简、居延新简、张家山汉简、敦煌悬泉汉简、额济纳汉简、阜阳汉简、吴三国东牌楼、走马楼吴简等。另外，石刻文、砖瓦文、金文、玺印文等，也显示了该时期文字使用的多样性。

四

汉魏六朝，文字经过了剧烈的隶变“解体”之后，书体发展至于自觉，楷书走向成熟。其中的重要因素，固然有文字自身的发展规律，而媒介发生了革命性变换，即纸张在这个时期真正成为社会日常生活的书写载体，不仅对书体发展，就是对文体“自觉”，都是最为直接的影响因素之一。

由于材料物理属性制约，诸如质量密度、书写程序以及耐消磨度等，尤以石刻数量庞大且字形保存相对完整。碑刻文字（包括墓碑、墓志铭、造像记、摩崖刻石等）和墨书写本文字，另外还有刻写在砖瓦上的文字以及流传下来的法帖文字等，构成本时期汉字实际使用调查的最基本材料。从物质技术因素来

^① 朱葆华著：《图说汉字发展史》，前言，齐鲁书社，2006年。睡虎地秦简整理小组编：《睡虎地秦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90年。该本有关《日书》甲种释文注释见第179—228页，乙种见第231—255页。